



☒唐末☒歌的思想☒向

メタデータ	言語: eng 出版者: 公開日: 2013-07-23 キーワード (Ja): キーワード (En): 作成者: 康, 萍 メールアドレス: 所属:
URL	https://doi.org/10.24729/00004370

论唐末诗歌的思想倾向

康萍

弁言

本文所说的唐末，是指唐懿宗咸通初至昭宣帝天祐末这一时期，即文学史上通常所说的“晚唐”的后期。这一时期的诗人，对步入末世感受最甚。晚唐前期的杜牧、李商隐这辈诗人，尚有“平生五色线，愿补舜衣裳”（杜牧《郡斋独酌》）的梦想，而他们连这一梦想都没有了。

骚人久不出，安得国风清。拟掘孤坟破，重教大雅生。

皇天高莫问，白酒恨难平。悒快寒江上，谁人知此情。（裴说《经社工部坟》）

风骚如线不胜悲，国步多艰即此时。

爰日满阶看古集，只应陶集是吾师。（郑谷《读前集二首》其二）

“大雅”或者“风骚”，自然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风上化下，指陈时政，具有社会内容的诗歌。遍观唐末诗作，裴、郑二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：“风雅”之作，为数寥寥，而占有绝对优势的则是反映个人遭际、个人心绪的诗作。即使是被称之为现实主义诗人的杜荀鹤、皮日休，一面为“风雅”消失而痛心疾首，一面也是写这类诗的好手。

在历代的评价中，这类诗作是屡为人讥讽的。“晚唐人诗多小巧，无风骚气味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之十六引《诗史》）“声调卑处，开大石之门。”（《唐音癸签》卷十引《艺圃撷余》）此类贬词比比皆是。苏雪林认为唐末诗歌乃是“洪波之末流，大声之余响”（《唐诗概论》）。唯明人许学夷别具只眼，谓“愚按晚唐诸子体格虽卑，然亦是一种精神所注……若格虽初、盛而庸浅无奇，则又奚取焉。”（《诗源辨体》卷三）古人的评价及其异同，也增添了我们对研究这一现象的兴趣。

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·勃兰兑斯说：“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，是一种心理学，研究人的灵魂，是灵魂的历史。”（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）唐末诗人的“灵魂”，主要体现在战乱诗、闲适诗、艳情宴乐诗和抒情感怀诗中，本文首先通过对于这四类诗的观察，来探究

唐末诗歌的思想特征。

战乱诗

唐朝末年战乱频仍，出现了大量的感时伤乱之作，其中固然也有忧念国家的，如司空图“空将忧国泪，犹拟洒丹墀”（《乱后三首》其一），有描写民瘼的，如杜荀鹤《乱后逢村叟》，但这种诗是极为鲜见的。总的看来，战乱中的国家、人民在唐末诗人心目中并未占重要地位，大量描写的只是个人的遭际和心绪。

一，生民之苦往往只是个人痛苦的衬景

征人草草尽戎装，征马萧萧立路旁。

尊酒阑珊将远别，秋山迢递更斜阳。

白髭兄弟中年后，瘴海程途万里长。

曾向天涯怀此恨，见君呜咽倍凄凉。（韩偓《见别离者因赠之》）

征人的别离却使诗人想到自身的天涯之恨，诗笔很快由征人而转向自我，征人的离别只是一个触发诗人凄凉心景的契机而已。更多的战乱诗则是把生民之苦作为战乱景物的点缀，以此为背景，或衬托个人的遭际，或抒发个人的感慨。前者如杜荀鹤的《将入关安陆遇兵寇》叹息“几州户口看成血……四面烟尘少无处”，只是为了由此引向“不知吾土自如何”。后者如李咸用的《春日喜逢乡人刘松》：

生民有恨将谁诉，花木无情只自红。

莫把少年愁过日，一尊须对夕阳空。

虽有为民诉不平之语，但接下去却并没有为民请命的话，只看到诗人被触发的感慨。盛中唐诗人，把反映生民当作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杜甫的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，白居易的“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（《寄唐生》）韩愈的“上陈人疾苦，无令绝其喉。下陈几旬内，根本理宜优”（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）都是明证，所以他们能自觉而忠实地反映民生。而唐末诗人对人民的态度极为冷漠，诗中偶而提及人民的痛苦，但很少有关怀、解救之情从下表中可知，唐末诗人很少有整篇全部描写生民疾苦的诗作：

	罗隐	皮日休	陆龟蒙	司空图	聂夷中	韩偓	郑谷	吴融	杜荀鹤	韦庄
诗歌总数	449	443	491	363	37	339	327	324	307	288
整篇反映 民生之作	1	7	5	1	6	0	1	2	8	1

二，战乱中往往言及性命之忧，有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

离乱身偶在，窜迹任浮沉。

虎暴荒居迥，萤孤黑夜深。（司空图《避乱》）

残酷的战乱中，自身随时都可能被荒野、被暴虎所吞噬，这是典型的性命之忧。

一茎两茎初似丝，不妨惊度少年时。

几人乱世得及此，今我满头何足悲。（杜荀鹤《白发吟》）

这是庆幸生存的代表之作。“须知世乱身难保”（司空图《狂题二首》其二）可以看作当

时的一个共同音。

在战乱中，诗人们不仅觉得性命难保，还有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，茫茫然不知前程何在。司空图《渐上》云：

西北乡关近帝京，烟尘一片正伤情。
愁看地色连空色，静听歌声似哭声。
红蓼满村人不在，青山绕路路难平。
从他烟棹更南去，休向津头问去程。

天地茫茫，一片伤情，今日路途难行，又不知明日去程。这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何其深重！

三，避乱入山林是不得已的，诗人却往往以此满足

唐末有不少诗人描写过避乱归入林泉山水后安逸、满足的心境。如：

乱世归山谷，征犖喜不闻。诗书犹满架，弟侄未为军。
山犬眠红叶，樵童唱白云。此心非此志，终拟致明君。（杜荀鹤《乱后归山》）
磻户芳烟接水村，乱来归得道仍存。
数竿新竹当轩上，不羨侯家立戟门。（司空图《磻户》）

乱世中获得一片净土，即足以喜乐。有了净土，便是封侯拜相也失去了引诱力。

四，陶醉于战乱中家人的团圆

战乱中，诗人除了关心自己，就是关心关系最为密切的亲友。杜荀鹤《和舍弟题书堂》云：

兄弟将知大自强，乱时同葺读书堂。

……

团圆便是家肥事，何必盈仓与满箱。

郑谷的《久不得张乔消息》是挂念战乱中分别的友人，能否安然到达家乡，寄以深挚的友情：

天末去程孤，沿淮复向吴。乱离何处甚，安稳到家无。
树尽云垂野，樵稀月满湖。伤心绕村落，应少旧耕夫。

总之，诗人对于战乱中的国家、人民虽有忧念之心，但这种忧念是极其微弱的，是点缀的景象。这个特点是有别于前代诗作的，是唐末这个时代所特有的。一般说来，盛中唐诗人对国家、朝廷都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之情，如杜甫的《北征》虽是为了“苍茫问家室”，但诗中充满着关心君主、国家之情。韩愈虽在贬中，仍有报国之心，“欲为圣朝除弊政，敢将衰朽惜残年”（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）。君主、国家在盛中唐诗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他们热心于国事，即便是指斥朝廷，揭露黑暗，但仍然对朝廷寄予着希望，白居易的讽谕诗再三强调“愿得天子知”（《寄唐生》）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唐末诗人则不然，从下表的统计可见，在唐末诗作中，上述类型的战乱诗要远远多于传统意义上的“三吏三别”式战乱诗，就其数量之众而言，完全可以称之为主要倾向。

	罗隐	皮日休	陆龟蒙	司空图	聂夷中	韩偓	郑谷	吴融	杜荀鹤	韦庄
战乱诗 总数	43	4	20	23	0	22	35	22	47	49
时事 之作	5	0	5	2	0	2	0	1	3	6
生民 之作	0	3	1	0	0	0	0	0	5	1

闲适诗

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：“高蹈的世界，是由浮世的纷扰，个人的失意而生的苦闷的救济场。这无须乎说，是因为在那里独善——一个人的自由——绝对的被容许的缘故。”（《中国文学概说》）唐末诗人在战乱四起及仕途失意时纷纷躲进庄园、山林，力求忘却尘世的丑恶，让人的心境得以平和自由，但现实的纷乱又时时冲击着他们，使他们难以彻底“独善”。这种矛盾，使唐末诗人的闲适诗，又产生了不同的形态，即有人真正享受到了闲适，大多的人却在闲适的背景之后，掩藏着一个孤独、悲怆的灵魂。

绿树连村暗，黄花出陌稀。远陂春草绿，犹有水禽飞。（司空图《独望》）

这是一幅静静的画面，但犹飞的水禽却让人感到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寻觅着什么。陆龟蒙的《独夜》更是说尽了寂寥游荡的灵魂在清适景物中的苦闷：

新秋霖夜有清境，穷檐病客无佳期。……

独行独坐亦独酌，独玩独吟还独悲。

也是为此，在描写闲适景物时，诗人却多用阴寒和病态的字眼，例如：

惨惨日将暮，驱羸独到庄。沙痕傍墟落，风色入牛羊。（司空图《河上二首》其一）

寒蛩傍枕响，秋菜上墙生。黄犬病仍吠，白驴饥不鸣。（皮日休《秋晚留题鲁望郊居二首》其一）

荒庭古树只独倚，败蝉寒蛩苦相仍。（陆龟蒙《早秋吴体寄袭美》）

写的虽是田园，诗人着意的却是这种景物，足见其心理是何等的阴暗。唐代写闲适、艳情宴乐的诗到元、白后期才大量地出现。特别是白居易晚年官运亨通后，他所写的闲适诗，带有一种饱食终日、无所事事的满足感，如《食饱》：“食饱拂枕卧，睡足起闲吟。浅酌一杯酒，缓弹数弄琴。既可畅情性，亦足傲光阴。”唐末诗人也能写出一些真正闲适的诗，但更多的是借“闲适”来排遣痛苦和寂寞，希望将“自我”躲进人迹不到的“太古”之地。如果只能生活在人世，哪怕是比较恬静的田园，他们就不能抹去内心的阴影，在加了滤色镜的灰暗田野上徘徊着一个孤零零、寒颤颤的身影——这是唐末闲适诗中常见的情境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倾向。

艳情宴乐诗

唐末社会虽是日趋衰竭，毫无希望可言，但繁华都市所呈现的宴游奢华、纸醉金迷的色彩却刺激着艳情宴乐诗的产生。除杜荀鹤、聂夷中以外，著名的唐末诗人都有此类诗作，其中韩偓高达 58 首，为其全部诗作的 17%。在畸形都市生活的另一面，是国难深重的现实，这一社会的矛盾，也使唐末诗人所写的艳情宴乐诗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样态。首先是醉生梦死，纵情欢娱，这些诗往往表现出庸俗低下的情调。

咸通时代物情奢，欢杀金张许史家。

破产竞留天上乐，铸山争买洞中花。

诸郎宴罢银灯合，仙子游回璧月斜。

人意似知今日事，急催弦管送年华。（韦庄《咸通》）

这首诗很典型地写出了末世人的心理：社会就要崩溃，人生就要走向没落，何不抓紧时间，醉生梦死。带着这种心理，唐末诗人常常细致地刻划男女艳事、诗酒享乐，加以畸形的

欣赏。如韩偓《五更》的“怀里不知金钿落，暗中惟觉绣鞋香”，《屐子》的“方寸肤圆光嫩，白罗绣履红托里”，篇调都涉轻狂，品格也不高，甚至还有些诗人希望能时时沉醉于这种幽欢轻艳的生活，“自嗟此地非吾土，不得如花年年看”（崔珣《有赠》）。韦庄的“满筵红蜡照香钿，一夜歌钟欲沸天。花里乱飞金错落，日中争论绣连乾”（《病中间相府夜宴戏赠集贤卢学士》），根本看不到国家濒临灭亡的现实，而只有在佳人艳歌中醉生梦死。

但唐末诗人也意识到，这种生活随时都可能消失，“歌管纷纷是艳丽，土崩瓦解却增添了忧患”（吴调公《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》），因而大多的艳情宴乐诗，在狂欢烂醉中却隐藏着颓废伤感的情绪。

满耳笙歌满眼花，满楼珠翠胜吴娃。

因知海上神仙窟，只似人间富贵家。

绣户夜攒红烛市，舞衣晴曳碧天霞。

却愁宴罢青娥散，扬子江头月半斜。（韦庄《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》）

府相夜宴富丽丰盛，但诗人并不感到欢乐，而是满腹愁绪。如果说这首诗还比较含蓄，有些诗则明显地表现出颓废伤感的情绪。

昔年曾向五陵游，子夜歌清月满楼。

银烛树前长似昼，露桃华里不知秋。

西园公子名无忌，南国佳人号莫愁。

今日乱离俱是梦，夕阳唯见水东流。（韦庄《忆昔》）

九衢风景尽争新，独占天门近紫宸。

宝马竞随朝暮客，香车争碾古今尘。

烟光正入南山色，气势遥连北阙春。

莫见繁华只如此，暗中还换往来人。（秦韬玉《天街》）

繁华旖旎的一切，都将一去不返，留下的只是梦一般的迷惘，令人伤情的现实。唐末的艳情宴乐诗，既有描写醉生梦死、纵情欢娱的一面，也有繁华丽景，华丽词语下面掩藏着的伤感颓废的另一面，这种两面性甚至包容在同一诗人的诗作中，是唐末艳情宴乐诗的一个突出之点，而从后一面中抒发出来的感慨乃至哀叹，也可以说是艳情宴乐诗的一个主要倾向。

抒情感怀诗

在抒情感怀诗中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忠君思想的消逝。唐末社会军阀相争，宦官专权，叛君弑君，屡见不鲜，儒家的传统伦理也随之崩溃。例如，即使是被称为“不忘君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六）的韩偓，也不曾为君主殉身。

偷生亦似符天意，未死深疑负国恩。（《避地》）

溅血惭嵇绍，迟行笑褚渊。四夷同效顺，一命敢虚捐。（《感事三十四韵》）

前一首诗是诗人天祐元年（904）抵湖南醴陵时作。他也感到没有殉节似乎深负国恩，但对现在的偷生却并不感到羞愧，而是以合天意自慰。后一首对昭宗被弑，最多只是在“多士已忘筮”中，以“独夫长啜泣”、“郁郁空狂叫，微微几病颠”（《感事三十四韵》）来表达自己的哀情和愤慨。受过君主知遇的韩偓尚且如此，其他人对国家的观念就更淡薄了，他们往往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。

只言圣代谋身易，争奈贫儒得路难。（罗隐《江边有寄》）

十二三年就试期，五湖烟月奈相违。

何如买取胡孙弄，一笑君王便著绯。（罗隐《感弄猴人赐朱绂》）
 渤澥声中涨小堤，官家知后海鸥知。
 蓬莱有路教人到，亦应年年税紫芝。（陆龟蒙《新沙》）

这些都是尖酸辛辣的讥讽。诗人不是借讽喻以振兴朝廷，革除弊政，而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攻击嘲骂而已。

君主、朝廷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，他们对做官也不感兴趣，对国事是冷漠待之。如郑谷说“四郊多垒日，勉我舍朝簪”（《赠泗口苗处士》），韩偓说“官途巇险终难测，稳泊渔舟隐姓名”，杜荀鹤的《题汪氏茅亭》说得更透彻：

茅亭客到多称奇，茅亭之上难题诗。
 出尘景物不可状，小手篇章徒尔为。
 牛畔稻苗新雨后，鹤边松韵晚风时。
 君今酷爱人间事，争得安闲老在兹。

“人间事”当然也包括国事、功名之类，他是酷爱“人间事”的诗人，但面对“出尘之景”的茅亭，却以为关心“人间事”还不如终老茅亭。

国家既然可以不问，生民疾苦自然也可以漠然处之。司空图宣称“乱来已失耕桑计，病后休论济活心”（《丁巳重阳》），而吴融的《祝风三十二韵》则在描写了几句亲眼目睹的百姓痛苦之后，马上就转入寻思怎样过闲适的生活，诗中并没有拯救苍生的热情，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逸。

将生陶令中，又盖姜肱被。自可致逍遥，无妨阅经史。
 吁余将四十，满望只如处。

由于对国事、仕途均感无望，唐末诗人往往进而感到整个人生前程无望。这类诗几乎人人都有，罗隐、司空图、韦庄的诗中则更为集中。

不用名山访真诀，退休便是养生方。（司空图《华下》）
 得即高歌失即休，多愁多恨亦悠悠。
 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（罗隐《自遣》）
 有国有家皆是梦，为龙为虎亦成空。（韦庄《上元县》）
 当年不乐意，徒为他人留。……
 何不夕引清奏，朝登翠楼。逢花便折，闻胜即游。……
 死生同域不用惧，富贵在天何足忧。（李咸用《长歌行》）

这种人生态度何其可怕，万物皆为空虚，人生在世便是及时行乐，走一步是一步，纯然是一种颓废绝望的思想。盛中唐诗人由于对国家充满希望，对个人的前程自然也是充满信心。杜甫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实在是一种非凡的抱负。即使是处于帝国晚年难有作为的杜牧、李商隐，还梦想着“平生五色线，愿补舜衣裳”（杜牧《郡斋独酌》），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（李商隐《安定城楼》）。唐末诗人也曾发出“有心重筑太平基”（韦庄《长年》）微弱的呼声，但“平生所韬蓄，到死不开豁”（陆龟蒙《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》），大多数诗人都感到前程茫然。我们可以看下面一张表，唐末诗人惯于用“夕阳、晚照、落晖、日落”之类的同义词，其比例之大，远远超过盛中唐、晚唐前期诗人。

唐末诗人	罗隐	皮日休	陆龟蒙	司空图	聂夷中	韩偓	郑谷	吴融	杜荀鹤	韦庄
诗歌总数	449	443	491	363	37	339	327	304	317	288
“夕阳”等数量	15	4	29	17	1	21	23	44	11	49

前期诗人	杜甫	韩愈	柳宗元	刘禹锡	杜牧	李商隐				
诗歌总数	1424	399	161	791	523	595				
“夕阳”等数量	59	3	5	23	35	31				

综上所述，我们大概可以捉摸到唐末抒情感怀诗的主要内容：君主、国家的概念在诗人心中已经淡薄，诗人和统治者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疏远甚至矛盾的状态。诗人对人民已经顾不上了，他们自救不暇、自救不能，常常处在伤感与颓废之中，走向绝望的人也时有之。这一心灵历程完全是唐末诗人所独有的。

唐末诗歌思想倾向的成因

唐末诗歌之所以产生这一倾向，除了王朝分崩离析、国运衰竭这一主要原因，还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成因。

一，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

由于唐政权的衰落，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。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哲学思想，无名氏所著的《无能子》就是一例。《无能子》的观点主要有三：一是反对君臣之分，思孝伦理。所谓“君苦其臣曰苛，臣侵其君曰叛，父不爱子曰不慈，子不尊父曰不孝，兄弟不相顺为不友不悌，夫妇不相一为不贞不和。为之者为非，不为之者为是。是则荣，非则辱，于是乐是耻非之心生焉，而争心抑焉。”二是不满于贵贱之别，反对“美名”。所谓“贱慕贵，贫慕富，而人之争心生焉。”“夫所谓美名者，岂不以居家孝，事上忠，朋友信，临财廉，充乎才，足乎艺之类耶？此皆所谓圣人者尚之，以拘愚人也。”认为“自古帝与公卿大夫之号，皆圣人强名，以等差富贵而诱愚人尔。”三是指责圣人过之。所谓“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，强分贵贱尊卑以激其争，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，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，俾逐其末而忘其本，纷其情而伐其命，迷迷相死，古今不复，谓之圣人者过也。”无能子向往的是无伦理纲常、无争无斗的太古时代，所谓“无男女夫妇之别，父子兄弟之序。……无夺害之心，无瘞藏之事。任其自然，遂其天真，无所司牧、濛濛淳淳，其理也居且久矣。”

这一哲学思想虽然有着老庄哲学的外衣，但在本质上是与封建统治思想相对立的，它否定了君主的神圣地位，否定了封建的伦常礼法，否定了人们对于功名富贵的追求，而表现出一种挣脱封建纲常名教、寻求人的解脱的新的思想。唐末诗人有多少人读过《无能子》，虽不可考，但它无疑是代表了当时某一种人愤世疾俗的心态。

二，文学理论变化的影响

唐末的文学理论也曾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，强调刺世救民，益于教化。如杜荀鹤“诗旨未能忘救物，也情奈值不容真。”（《自叙》）“君诗通大雅，吟觉古风生，外却浮华景，中含教化情。”（《读友人诗》）皮日休“诗之美也，闻之足以劝乎功，诗之刺也，闻之足以戒乎政。”（《正乐府序》）但理论是如此，诗歌实践上并未实现之，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，那些被称为现实主义的诗，虽不乏有力之作，但未蔚为大观，诗人的刺世救民，“虽不能说丝毫不补，但所补者实在有限得很”（罗根泽《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》），现实主义的理论并未能推动唐末诗歌的发展。

刺世救民的文学碰上了拯救不了的社会，只能转向自娱，“变为自娱娱人的文学”，（同

上)“缘情写怀”的文学理论便应运而生。

韦庄的“清丽说”和韩偓的“香艳说”是当时富有影响的文学主张。韦庄《又玄集序》云：

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，或百篇之内，时记一章，或全集之中，唯征数首。但撮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，莫究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。

韦庄选取诗歌的标准是“清词丽句”。他在《乞追赐李贺、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》云：

有李贺、皇甫松、李群玉、陆龟蒙、赵光远、温庭筠、刘德仁、陆逵、傅锡、平曾、贾岛、刘絳珪、罗隐、方干，俱无显遇，皆有奇才，丽句清词，遍在词人之口，衔冤抱恨，竟为冥路之尘。伏望追赐进士及第，各赠补阙拾遗。”

韩偓则从“清丽”走向了“香艳”。其《香奁集序》云：

遐思宫体，未敢称庾信工文；却谓《玉台》，何必倩徐陵作序。初得捧心之态，幸无折齿之惭。柳巷青楼，未尝糠粃；金闺绣户，始预风流。咀五色之灵光，香生九窍；咽三危之瑞露，春动七情。”

这是公然自命与齐梁宫体同流。皮日休还提出了“文学隐逸说”，其《鹿门隐书》序云：

醉士隐于鹿门，不醉则游，不游则息。息于道，思其所未至，息于文，惭其所未周，故复草《隐书》焉。

这是把文学当作隐逸闲息时的消遣工具。另外，他在《七爱诗》中虽盛赞白居易的“为文六义全”，但又仰慕白居易“天下皆汲汲，乐天独怡然”、“忘形任诗酒，寄傲遍林泉”的闲逸之态。

不论是“香艳说”还是“隐逸说”，都是自娱娱人，都是归向“缘情写怀”的文学思想。这些文学思想显然引导着唐末诗人的笔触向人的心灵深处探触，去抒写“自我”。

三，诗人仕途遭际的影响

唐末的一些著名诗人在仕途上都不顺利，或屡举不第，或沉沦下僚，或贬谪异方。唐末的科举舞弊滋甚，“不问士行文艺，但勤于请谒”（《北梦琐言》卷四）。有真才实学者往往难以得售，如罗隐“少英敏，善属文，诗篇尤俊，拔养浩然之气。乾符初举进士，累不第”（《唐才子传》卷第九），杜荀鹤“早著诗名”，但功名“蹇进，连败文场”（同上）。皮日休则是凭着他冷僻的姓氏，才侥幸中了进士。聂夷中仅为华阴县尉，于湮终于泗州判官，韩偓、司空图那样能够接近皇帝的诗人则屈指可数。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诗人或身居高官，执政朝廷，或身虽贬而言论能闻于君主。与唐末诗人相比，他们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。由于唐末诗人大抵无缘接近上层，加上国家的衰败，他们对君主朝政的冷淡不关痛痒，对国家、个人前程的悲观绝望，也就是极自然的事情了。

四，南方地理环境的影响

唐末诗人以居住南方者为多。本文所论的诗人，除韩偓、司空图、韦庄以外，其余均为南方人。杜荀鹤，池州人；罗隐，钱塘人；吴融，山阴人；郑谷，宜春人；皮日休，襄阳人；陆龟蒙，松江人。即使是京兆人的韩偓，晚年亦在闽地；杜陵人的韦庄，晚年亦在蜀地。刘师培认为北方多尚实际，南方多尚虚无，“民崇实际，故所著文，不外论事析理二端；民尚虚无，故所作之文，或为言志抒情之作”（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）。唐末诗人多与南方有关，旖旎的自然山水、繁华的都市经济熏陶了他们，闲适诗、艳情诗的出现也有着地理环境上的原因。

五，诗人个人的叛逆性格

都市经济的繁荣，儒学的衰微，无能子之类的叛逆思想，都或多或少给诗人以无形的影响，给他们带来了通脱叛逆的性格特征。在一些唐宋人笔记中记载着：

唐薛澄州昭纬……恃才微物……每入朝省，弄笏而行，旁若无人，好唱《浣溪沙》词。（《北梦琐言》卷四）

（罗隐坐船），舟人告云：“此有朝官。”罗曰：“是何朝官，我脚夹笔，可以敌得数辈。”……由是不果召。（《唐语林》卷七）

皮日休，郑尚书愚门生。春闱内宴于曲江，醉寝别榻，衣囊书笥，罗列旁侧，率皆新饰。”（《唐语林》卷七）

（陆龟蒙）“尝从张搏游历湖、苏二州，将辟以自佐。又尝至饶州，三日无所诣，刺史率官属就见，龟蒙不乐，拂衣去。”（《唐才子传》卷第八）

赵光远等千金之子，厌饫膏粱，仰荫承荣，视若谈笑，骄侈不期而至矣。况年少多才，京邑繁华，耳目所荡，素少闲邪之虑者哉。（《唐才子传》卷第九）

蔑视朝官，轻视功名，倚红偎翠，傲啸山水成了唐末诗人的风尚。但面对国家衰败，前程无望的现实，唐末诗人的心理又颇为复杂：在狂妄自负中夹杂着苦闷伤感的情绪。所以唐末诗人是以辛辣讥讽的笔调攻击、谩骂君主、朝政，厌恶纷争的今世，向往纯朴愚昧的太古。既沉醉于闲适、艳情宴乐的生活中，又不免流露出浓厚的愁绪。

结语

对于一个时期的文学主要倾向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评价，主要应该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，展现了前代所没有的新鲜内容，及其是否有衣被后代的文学养料。唐末诗歌偏于“自我”的描写，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衡量，其反映社会的深度较之于直接描写民瘼之作，显然是浅而窄的。但唐末诗人能够从士人这一阶层的角度反映时代的面貌，这一面显然也不是那些“现实主义诗作”所能包容的。盛中唐诗人之所以为人民呼吁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多数本身是官僚，是统治阶级中一员（虽然是比较清醒的一员），小李杜亦然。唐末诗人少有官僚，而身份接近于平民，其声音本身就近乎平民的声音，其“描写自我”的作品未尝不能看作是反映现实之作。只有把这些作品和那些直接反映生民疾苦之作结合在一起，唐末社会真正的、完整的面貌，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。同时，从诗歌的发展来看，唐末诗人继承并发展了中晚唐诗人在诗歌内容表现上的一些特点。他们表现内心情思，不限于元白的生活琐事，温李的绮情艳思，而是在各种场景全面地表现。如此众多的诗人，如此细致全面地从各个角度表现“自我”的心情意绪，喟叹思索人生的本身，探寻人心灵的深处，这一切，都是盛中唐诗人 and 晚唐前期诗人所难以企及的。唐末诗歌虽有伤感颓废的情绪，有某些趣味庸俗之作，但从总体上说，唐末诗歌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时代，展现了前代文学所没有的新的气象，是值得研究和肯定的。

（作者简介：康萍，女，1961年2月生。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毕业，获硕士学位，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艺术编辑室主任、副编审。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唐宋时代文学研究。）